



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批判的三个维度

董文墨，梅珍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湖北 武汉 430077)

[作者简介]董文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硕士研究生；梅珍生，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围绕人生存境遇中无法摆脱技术理性主义以及大众文化的异化、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的异化，从生存境遇、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交往实践三个维度，对异化及其扬弃做了充分的探讨。其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高扬了人文主义的旗帜。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5-3980.2012.01.006

[文章编号] 1005-3980 (2012) 01-0026-05

自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各个流派。每个流派都以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继承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宝库。在百家争鸣的理论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对发达资本主义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对二十世纪的人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角度，发掘其人文主义精神旨趣，以就教于方家。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围绕着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及社会学批判为主题，以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为基本出发点，其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高扬了人文主义的旗帜。

一、对理性及大众文化异化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在《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展开了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社会批判主题，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主题。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以超越旧式分工为前提，是为了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超越中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批判理论内在于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批判理论对现存的批判活动同人类社会的变革运动、同人的自由和解放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它本身就是变革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的影响，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他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

收稿日期：2011-11-22

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1](第 250 页)]。而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简单的否定与谴责,而在于为人类的现存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的维度,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自我意识。

在后来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系统的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更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题。所谓的技术理性主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术万能论。它相信人不仅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宇宙的理性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征服自然,人有可能在此岸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种对理性的盲目推崇是使理性发生异化的根源。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技术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他们揭示了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以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视野中,启蒙精神意味着强调理性万能,理性至上,把人从神学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在解放的过程中,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界无可争辩的统治权,从而改变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理性法则在社会运行机制和在征服自然的活动中普遍运用的结果,将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是确定人的“普遍的自由”和“自我确定权”。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运动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无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天堂和地狱是联在一起的”,“进步转化成了退步”。^[2](第 1 页)]具体来说,人们在用科学技术打破神学的愚昧时,科学技术形成了新的神话,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达到对自然的统治,却遭到了自然的报复,而人与人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也互相异化,人普遍的被物化,技术理性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相反却成为了一种统治力量,遏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启蒙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就在于“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第 113 页)]

如果说技术理性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则可以看作是技术理性这种异化力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通过美化和肯定现存秩序而替现存世界辩护的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通过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从而为现存辩护。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文化工业的分析解释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化力量的消极功能。首先他们认为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大众文化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其次,由于大众文化可以批量生产,无限度复制使它具有明显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特征,而这个特征,使它丧失了作为真正艺术品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大众文化由于是建立在技术理性统治基础之上的,它就具有了很大的欺骗性,它迎合了在疲惫机械劳动中人们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现存的制度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已丧失构造出一个不同于他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世界的能力”^[1](第 262—263 页)];最后,由于大众文化深度的消减,大众文化虽然从表面上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对人的操控和统治更为深入,具有无所不在的特征,“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2](第 113 页)]。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操控性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造成人们面对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但却反抗无效的局面。“人们只能了解自己的虚无,只能记住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2](第 143—144 页)]文化的异化是人的深层次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要扬弃大众文化的异化,必须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恢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也就是恢复人的自觉的生存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技术理性批判及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强调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关注。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他们要求恢复人的创造性,恢复人的自由的生存方式。当技术理性和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力量,人已经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统治,成为了它们的附庸的时候,霍克海

默和阿多认为只有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人的创造性的再生，才是人通往自由的坦途。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更是将这种批判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上唤醒人类的主体性的觉醒，唤醒一种发自人类实践本性的深刻的文化反抗。

二、对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异化的批判

随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在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条件下的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异化进行了批判，他们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作品中，马尔库塞主要讲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的异化的生存困境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扬弃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产生了根本的改变，“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31] 第 7 页}技术理性的统治是通过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而实现的，现代技术理性和传统政治方式的结合造就了现代社会中的集权主义统治力量。“技术进步持续不断的动态，变得为政治内容所充满，技术逻辑斯被转变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辑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31] 第 136 页}技术理性的发展，使得政治统治更多的依靠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手段和文化手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和强权手段，这使得人心甘情愿的被纳入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中，不再具有反抗精神，而同时技术理性消解了人的自由所应该具有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实践存在的维度，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只是单向的适应社会，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31] 第 68 页}这样的现状反映出的本质在于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倒，而要消除技术理性的操纵统治功能，扬弃技术异化，最根本的途径是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向形而上学倒转，并同艺术相结合，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合的新理性，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马尔库塞在 1955 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相结合，创造出了著名的压抑性心理机制理论。他在书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力正在被日益动员起来，以阻止用它自己的资源区抚慰人类生存。所有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40] 第 17 页}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异化力量的普遍化和技术理性的统治，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压抑性的本质特征，具体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劳动异化为苦役和爱欲降格为单纯的性欲。而想要突破这个心理机制，实现非压抑性的生存方式，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将工作转变为消遣，二是将性欲升华为爱欲。这两种途径将“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

马尔库塞揭示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现状，他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以恢复人的创造性为根本途径，虽然在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具体规定方面仍需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们可以从中清晰的看到他的理论对人的关注和怜悯。而他关于压抑性心理机制的论述则与马克思主要从阶级斗争来对异化进行扬弃的视角不同，他更强调以人的感性力量的解放和人的内在爱欲的复活来反抗理性文明的压抑，以人的内在感性创造力的发挥为基础建立理性与本能的新联系。他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人自由自觉的主体性的生成。

弗洛姆同样也对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关注，在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中他精辟的阐述了人类悲剧性的命运，即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要超越自然，人的自由与孤独并存是人类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上的个体化都不可逃避的双重后果。人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对安全感的怀念和对自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主动自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面对这种心理机制，弗洛姆提出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的学说，强调用爱心去工作，强调以爱心和消遣为基础、积极实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和人的自我、创造性的实现。在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自为的人》和《健全的社会》中，他从社会性格结构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现代人的性格结构的异化性质。在弗洛姆看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主要表现出了一种非生产型的性格结构，这是一种非创造性的生存状况，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机制，这种性格结构的异化是更为深层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念，丧失了

个性和自我意识。针对这一问题，弗洛姆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层面上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形成以爱和理性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性格结构，从而确立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社会。他为此还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贯穿在弗洛姆理论中的核心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以人的爱来与理性相结合，以爱来与理性形成一种张力，来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他继“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之后又提出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来继续揭示现代人的深层的异化。他指出在现存社会中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占有也从囤积型转变为消费型，人们占有的人和物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的消费。弗洛姆认为这种以无限度的消费为旨的指向一切存在物的“占有”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物化现象，是人的生存结构的异化，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把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要突破这一生存方式的异化，就要唤醒人们独立、自由、批判的意识，用积极的行动生存，从而达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形成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

三、对交往行为异化的批判

哈贝马斯则深化并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技术理性批判，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在于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和商谈伦理学是交往行为理论在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维度上的进一步展开。

哈贝马斯明确的界定了科学技术的两重性，一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形式。哈贝马斯强调应当在理性的平台上，从理性的内在机制去揭示理性异化的原因以及重建理性的途径。他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了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构想，主张认识是建立在社会历史条件中的活动，而兴趣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理性指导原则，是“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的基本导向”。^[5](第 199 页)]这样哈贝马斯就确立了兴趣在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即知道认识，作为认识的基础，同时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地位。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文化的异化的根本问题

在于技术的认识兴趣的发达及技术成果的滥用。而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则应该充分发挥理性的潜能，突出“理性反思的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核心地位，重建合理的理性范畴。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是导致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要消除技术异化，就必须以交往来代替劳动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他突出强调了交往行为的主要内涵在于主体间性，也即主体和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对于主体间性的强调，也就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换，哈贝马斯将这一转变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强调通过对话建立共识，建立“理想的言语情景”，为开放的、自由的、自主的、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交往和共识奠定基础。语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因此建立平等的、合理的言语行为模式就成为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关键。交往参与者遵循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进行交往，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其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结构，即自主、平等的主体间平等、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关键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7](第 71 页)]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交往的异化是最深层的异化，是科学技术等文化力量异化的深层基础；而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则在于交往的合理化和交往地位的突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他把关于交往的“不合理化”现象的批判转化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的批判，把交往的合理化诉求在实践层面上转化为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任务，即转变为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外在于自然、社会等存在领域的独立的实体性领域，而是内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各个领域的文化层面，它是交往行为“总是已经”在其中运行的地平线。摆脱“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主要途径应当是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协商和非强制性意见一致的功能，推进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协调发展。

在政治领域，哈贝马斯倡导和实践交往行为理论，

要求建立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平等的话语政治模式。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他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7](第 131 页)]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化也带来了一系列内部的和国际范围内的问题,“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7](第 134 页)]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正是试图在各种紧张和冲突的两极之间找到一条新思路,开展“后民族民主”的、程序主义的、商谈伦理的对话政治。他的做法是扬弃民族国家,以后民族国家构成世界主义的政治。后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保持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主体的前提下,抛弃民族国家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国机构,用以补充民族国家职能上的严重不足。这种后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以商谈伦理基础上的话语政治模式,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哲学维度的扩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视主体间性的作用,强调主体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并将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予以阐述。他最大的理论特色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弱化生产力的作用,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来突出交往行为的重要性。他的整个理论在突出人的作用的同时,深深的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作为 20 世纪西方有影响力的流派,他们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但转换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视角,他们重点强调人的作用,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张扬人的主体性。法兰克福学派的诸

人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分别引入了解释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到大众文化的批判,从性格结构层面的异化分析再到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们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世界的改造到把兴趣、爱心引入审美艺术和工作,关注主体间性对世界的塑造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不断扩展。归结到一点,对人的关注,对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崇高理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与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 [1] [德]麦克斯·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李小兵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2] [德]麦克斯·霍克海默, 特奥多·威·阿尔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洪佩郁, 月峰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面人[M]. 左晓斯, 张宜生, 肖滨译.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 薛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认识与兴趣[M]. 郭官义, 李黎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李黎, 郭官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7] 尤尔根·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邓念雄]